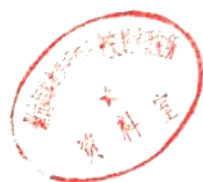


武汉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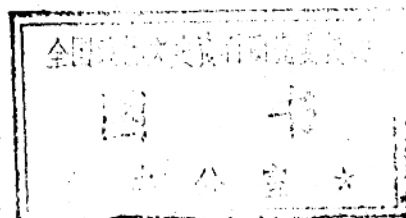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武汉文史资料

(选 辑)

第 二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一年三月

目 录

江汉军区域工部在武汉解放前地下工作的一页

-余 杰 (1)
- 武汉解放前夕我们是怎样对三府两局进行策反的
.....张式训 谈 瀛 吴先铭 郑桓武 (31)
- 武汉“和平运动”始末记.....艾毓英 (55)
- 战斗在敌人包围之中.....吴显忠 (77)
- 忆武昌真空时的一支民众武装.....张云冕 周家泉 (86)
- 略谈汉口市的中小学“教联”.....秦仲祥 (89)
- 记《汉口外勤记者联谊会》.....陈 七 (94)

C. C. 在湖北的实力派——“十人团”.....刘鸣皋 (101)

我在武汉“劫收”的前前后后

- 《“四大金刚”之一的自述》续篇.....徐恩宇 (117)

不算伤心的“伤心史”

- 一段脱离舞台生活的回忆.....陈伯华 (134)

汉口法租界内的种种.....汪应云 (145)

武汉第一个教会医院——普爱医院.....胡学汉 (152)

武汉大流氓——“红帮大爷”周汉卿.....明夷整理 (159)

张五婆大骗案.....樊 明 (167)

略谈汉口市中小学“教联”

秦 仲 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汉口市政府所属公立小学有四、五十所，中学四所。公立小学的教职员工（以下简称教工）最多，在当时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也最深重。因而组织起来向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的要求，非常迫切。“汉口市公立小学教职员工代表联合会”（以下简称教联）应运而生。继而公立中学教工也选派代表参加，组织扩大为“汉口市公立中小学教职员工代表联合会”。在地下党领导下，反饥饿，反迫害，以至后来保产护校，迎接解放，都作过一定的贡献。

在日本投降到武汉解放那段时期，国民党反动政治势力伸入各个学校。公开的党团组织，在小学有国民党区分部，中学有区党部；还有三青团区队部。中统、军统等秘密特务组织也在暗中活动。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主委袁雍（老牌中统特务）、汉口三青团干事长郎维汉，则是幕后控制教育界的核心人物。不少的中小学校校长，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时，在各中小学内，各学派的宗派活动，也很激烈。在中学主要是，“武高派”、“北大派”；在小学，“一师派”、“一女师派”势力较大。小学校长属于一女师的，就有十九人之多。

这些政治和学派势力，既互相勾结，又明争暗斗，抢夺地盘，操纵把持。凡属教工群众，想要维持饭碗，就得找人事关系，仰承校长的鼻息，政治上无自由可言，经济上更是困苦已极！

学校当局为了对教工进一步控制，几个大型小学校长居然结成学阀集团。三十二小校长李傑、十小校长黄义先、三十六小校长吴克屏、三十三小校长谭道晃、三民路小学校长张彬等人结拜为“十姊妹”，其中李傑倚仗权势，欺压教工，作风最为恶劣。而对待她们的上司，则不耻奴颜婢膝，百般奉承。在市长徐会之、教育科长周芮香的包庇和纵容下，她们可以任意地贪污舞弊，在教工头上作威作福。因此每当节日时，她们就要为这些“上司”送赃款、献礼物。如一九四九年初，徐会之离职卸任，她们在李傑家里设宴饯别，举行晚会，伴陪跳舞。周芮香的老婆生孩子，她们在中小学中大肆张罗，筹送金玉饰器。阿谀逢迎，丑态毕露。市政府社会科科长丁幼泉的老婆王长慧，由于得到她们的吹捧、哄抬，不仅当了三十五小校长，还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当时，各校贪污成风。如六渡桥小学教工给该校校长吴某算了细账，仅学杂费一项，六个学期，贪污银元近万元。即使规模很小的学校，每学期也可捞到银元数百元。市府教育科允许学校收学杂费收银元，向教工发工资则发纸币，利用银元飞涨和纸币猛跌的悬殊差额，使其喽啰贪污合法化。

这些当权者还组织所谓“校长联席会议”，每月开会一次，会后聚餐，实际上是一个贪污集团，在那里会谈对策，商讨统一步骤。他们舞权弄势，自鸣得意，而教工们称之为“资方会议”，嗤之以鼻。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统治濒于崩溃，币值江河日下，百物价格飞腾，教工工资常被拖欠，生活日益贫困，朝不保夕，再也煎熬不下去了。引颈北望，解放军挺进中原，恰如滚滚春雷，震撼武汉。受苦受难的人们，从黑暗里见到光明，开始觉醒起来。有的罢课索薪，有的清算贪污。然而，这些都是个别行动，零星散漫的，此起彼伏的。

同年秋季，我在宝善区（现硚口区）第三中心小学教书，与三十一小邵学贤等人酝酿，要夺取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胜利，必须组织起来。由于警宪监视甚严，只好秘密活动，个别串联，逐步扩大到全市公立小学，先由各校推派代表二人，筹备召开教工代表会议。

第一次会议在三十一小召开，到会代表六十多名，当场推举我为临时主席。会上，代表们情绪激昂，群谋群策，充满战斗气氛，决议向市政府请愿提出：（一）立即发放欠薪；（二）补偿货币贬值的损失。并推举邵学贤、安静、袁世慈、李静宜、夏直中等十多人为请愿代表，我和邵学贤为总发言人。

第二次代表会在生成里二十六小举行，正式成立了“汉口市公立小学教联”，并设置了常设机构——常务委员会，安静、邵学贤、夏直中等七人为常委，我和邵学贤为召集人。常委会设在三十一小邵学贤宿舍内。每周开常委会一次，两周开代表会议一次。不久，各市立中学也推派代表参加。常委会有马烈英（一女中）、陈育和（一男中）、夏贯中（二男中）、陈希宇等。从此，小学“教联”扩大为中小学“教联”。全市公立中小学教工团结起来了，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展开了有计划、有步骤的反抗斗争。

在斗争中，国民党市政当局对“教联”代表历次的请愿索薪，无不满口答应，而事后则又成为不兑现的空头支票。并暗中指使学校当局，宣传“财政困难”，替政府“诉苦”；有时也挤出一点贪污脏款，略施小惠，安抚部分人心。对坚持斗争的教工，则密派特务，进行迫害。

国民党的武汉警备司令部、宪兵队等镇压机关，在执行所谓《非常时期戒严条例》的借口下，经常侵犯“教联”代表的人身自由，冲击代表会场。为避免损失，排除干扰，各校代表采取轮换的办法，代表会议会场，也往往临时决定，不固定在一处。

另外还建立了云樵路（现黄石路）二十八小为中心的通讯联络网，以便互通声息，互相策应，统一行动。

当时，何家墩小学校长借故把该校教工代表停职，常委会为集中力量打击这个恶棍，决定在该校召开全体代表会议。会前该校校长向警备部密报：“教联”代表要在校集会暴动。因之，当赴会代表一到校门，就遭到一群武装特务的阻拦，并要一一进行人身搜查。几个常委当场据理抗争，代表们也坚持不散，就在这群荷枪实弹的武装特务监视中，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全体代表大会，揭露了该校校长卑鄙无耻的嘴脸和罪行。这位“校长”慑于群情激愤，只好悄悄溜走。接着，代表们赶至市政府抗议，那个被停职的代表立即复职，斗争赢得了胜利。

但是，斗争是曲折、复杂的。市政府一再对“教联”施加威胁，并扬言要停闭学校。这是非常毒辣的一手。我们的对策是，及时予以揭露，争取广大学生家长的同情；采用“饥教”斗争方式，学生照常到校，教师不上课。同时派遣教师代表分批轮流到市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请愿索薪，作群众性的持久斗争。有时包围市长的办公室直至深夜，有时到财政局坐索。还派代表陪同税务人员一道收税，提取现款。

另外，各学校在校教工，还普遍开展了清算贪污的斗争。校长们初见斗争锋芒，即已惊慌失措，连忙举行“校长联席会议”，推派代表胡光华等人与“教联”谈判，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拿出少量赃款，补助教工生活。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多时，反动政权奄奄一息，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市政当局根本无心维持教育局面，更不打算解决欠薪问题，教工生活日临绝境。穷极思变，要吃饭，要革命，广大教工的反抗斗争，更形波澜壮阔，如火如荼！

“教联”是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进行活动并逐步壮大的。先后充当代表联系群众、积极活动的地下党员，有安静、袁世慈、

陈育和等同志，与这些同志有联系的代表和教工，分布在各个学校里，起着鼓动和带头作用。

每当关键时刻，在“教联”代表会上，党员代表们都注意把斗争引到正确的方向。因为那时教工面临着生活困难的问题，部份代表往往只注意对学校当局清算贪污，向学生家长收取米代金，而放松了对反动政权的斗争。通过地下党员们的发言和谆谆善导，终于把人们从单纯经济斗争着眼引到政治、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

当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白崇禧准备逃窜的时刻，“教联”组织积极地配合开展了半公开的活动，深入各校发动教工群众保护校。武昌、汉阳各公私学校相继加入斗争行列，于是“教联”成了武汉中小学教工统一的群众组织。互通情况，守望相助，采取各种可能和有效的措施，制止一切破坏盗窃活动，完整无缺地保护了所有中小学校的公共财产，和全市人民一道，迎来了武汉的解放。



记《汉口外勤记者联谊会》

陈 七

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的武汉，春寒料峭，春雨绵绵。当时的政治气候也和自然气候一样：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颓势显著，处于彷徨、郁闷的挣扎状态。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们却感到春意盎然，似乎一个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时节即将到来。

“汉口外勤记者联谊会”（简称“外联”），正是这个时候酝酿成立的，它和稍晚些时候——约在七月间成立的“编辑人协会”，都属于报社职工自发组织的同业联谊会性质的群众团体。

当时我是中央通讯社武汉分社的采访组组长，是“外联”的发起人和第一届总干事，兹将记忆的一些经历简述于后，以见当时汉口新闻记者情况的一个侧面。

汉口黄陂路中段有一栋楼房（即现在江岸区人民政府），当时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新闻处。每天午后，照例在该处记者接待室发布新闻，也就形成新闻记者聚会的地方。接待室布置简单，大房间里周围一圈沙发，中间一张餐桌。新闻处把省政府及所属厅、处的一些政令、措施、活动等编成新闻稿，用材料纸写成小字报贴在一块块小木板上，放在桌上，让记者们自由选择抄录，拿回报社交差完成任务。大家到这里，除了抄新闻稿以外，还有记者碰头的作用。抄完了自己需要的新闻稿，便在沙发上休息一下，三三两两聊天，交换一些市面上发生的新闻线索，然后才分

途各自活动。

记者们在闲扯交谈时，也谈一些新闻界内部的新闻。四月间有人谈到某家小通讯社的“记者”，以揭发丑闻为要挟，勒索对方一块钱“现洋”。大家听了很气愤，认为这些小通讯社的记者，都是挂名不拿待遇的，搞个“记者”头衔，公开场合不露面，只在阴暗角落里招摇撞骗，敲诈勒索，记者的名誉都给这些“地下记者”败坏了。要想个办法整肃记者队伍来对付他们。

谈到整肃，问题又来了。如何整肃？谁来整肃？有什么法律依据？……都提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大家一议，只好发起一个由专业记者组织的“汉口外勤记者联谊会”，把那些“地下记者”拒之会外，以表明不承认他们是记者。同时利用我们手中的舆论工具，在社会上造成声势，迫使他们销声匿迹。当时大家一致赞成，当场就有二十多人签名发起。并推选陈其谁（陈七）、万寒林（万林）、李光吾等五人负责筹备。

经过一番筹备，“外联”便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二日（原定五月一日，因恐“官方”误会，才改在二日）上午在汉口蔡锷路（即滨江路平汉联谊社、现在的铁路俱乐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当时已有会员七十多人。事先经过组织宣传，成立大会开得很有声势。汉口市长徐会之等党、政、军的头子们都到会祝贺，报社的编辑、经理人员都有代表参加，二百余人挤满了那个小礼堂。

成立会由陈其谁担任主席，除报告了缘起及筹备经过外，还把“外联”成立的意义说了一遍，提出：记者要“忠实于自己的岗位，尽瘁于人民的事业，扶持国家正气，维护社会正义，团结力量，砥砺学术，使社会事业纳入正轨，使新闻事业更放光辉”。也谈到了要整肃记者卑劣作风的问题。冠冕堂皇一套话，都是说给到会的党、政、军的头子们听的，要他们觉得“外联”并无“不妥”之处。

会上通过会章，选举陈其淮（中央社）、李光吾（武汉日报）、单雁寒（女、和平日报）周慰曾（新湖北日报）、万寒林（华中日报）、王大可（新快报）、胡端豪（胡天风、大刚报）、戴剑秋（和平日报）、樊明（汉口报）、江涛（汉潮通讯社）等为干事，肖亮（和平日报）、袁明皓（武汉日报）、谭秋舫（女、华中日报）、杨坤潮（大刚报）等为监事，并推陈其淮、李光吾、万寒林为常务干事，肖亮为常务监事。还决定在武汉日报、和平日报、华中日报、大刚报轮流出刊《新闻记者》周刊，作为记者学术交流园地。

“外联”成立后不久，汉口饭店发生了一宗爱情纠纷的朱华自杀案，风闻有些“地下记者”借题向有关人索贿。“外联”即派人把情况调查清楚后在报纸上公布出来，想借以打击那些无耻之徒。实际上只是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因为当时新闻界是复杂的，“外联”也难得去认真地整肃，不过是虚张声势，以示“外联”的人们“清高”而已。

由于当时国民党军事败绩，政治腐朽，经济崩溃，很多靠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记者，也被物质生活的艰困压得喘不过气来。此时，武汉市政府有给公教人员配售平价食米措施，但只售给公职员工和教师，新闻记者属于“自由职业”，不在配售之列。“外联”也开过会，派代表去交涉，未得结果，大家也感到失望，觉察到官方对“外联”的态度是：表面上敷衍，实质上不感兴趣。记者组成“外联”想在经济生活上谋点福利的目的都没有达到，更使当时号称“自由知识分子”的记者们，对时局有了一些较清醒的认识。

一九四八年六月上旬，万寒林带着“剧宣四队”（这是我们的简称；该队当时全称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特勤署演剧四队”）

的李超同志来找我。他们队刚从长沙来到武汉，因为该队是抗日战争时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的老班子，人员思想进步，国民党看不顺眼，所以来武汉后，既不给他们解决驻地问题，也不安排演出场地，目的是要把他们卡死。当时他们驻在南洋大楼（现一轻局产品门市部）的屋顶走廊里，时在初夏，走廊无门窗，风雨烈日的侵袭，令人不堪设想。我和万寒林在看后回来，觉得太不象话了，应该支持一下，何况该队还打着“联勤总部”的牌子呢。这个意思在记者中一交流酝酿，都很气愤。觉得“外联”的记者只有用几支笔杆、几块报纸版面，在报纸上造舆论，把四队在汉的遭遇向社会上公布，造点压力。在多数人赞成的推动下，开了个“外联”的干、监事联席会，决议由“外联”出面开个茶话会欢迎四队来汉，为了把声势搞大些，还约了各报社的编辑人员参加欢迎会。

六月十七日下午在洞庭街新生花园（现为健康幼儿园）开了一个茶话会，到会的有演剧队四队全体队员，“外联”会员和编辑人员共四百多人。陈其淮致词，介绍了四队的历史，现在的遭遇，表示“外勤”支持他们，向社会呼吁争取同情和帮助。随着四队队员们表演了许多节目，除集体节目外，张武、张骏声、舒模、王晓芳、李庶民、张客都有单独表演。节目内容都是些有进步意义的讽世之作，可算得是对当时社会的一支投枪。最后是“外联”邀请的汉口美国新闻处放映了新闻电影。

第二天，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消息、特写搞得确实热闹，扩大了社会影响。因为，“老武汉”们对四队并不陌生，从报纸上得知他们的“冷遇”，都表示关心和同情。但军、政当局对我们的搞法感到恼火，却也无可奈何。拖到八月上旬，该队来汉后的第一个戏《春》，才与观众见面。给被政治空气窒息得难受的武汉人民，送来了一点春的信息。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正被迫准备在江淮间大战役中孤注一掷，桂系白崇禧率领其最精锐的张淦兵团来汉，布防于平汉铁路南线。在武汉摆起一副“戡乱”的架子（如办“戡乱训练班”，成立“民众自卫队司令部”等）。但色厉内荏，政治形势恶劣，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作为自由职业的记者们，接触面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以及进步青年和民主老人，都有交往；因之对时局的了解比较清楚深刻，激起了各式各样的思想起伏。尽管环境各异，但历史向前逼来——江汉名城终将解放。记者群无论进步的、中间的、反动的，表面上都在干着同样的新闻采访工作，实质却各有打算：如何迎接明天。

十月间，我和武汉日报的李光吾、华中日报的詹沙浪同行，随张淦兵团到河南平汉线南段的信阳、确山、驻马店等地和广水襄阳公路沿线直到枣阳才回汉口。此行报导任务不多，因和白崇禧的这支号称“猛勇善战”的部队同行，看出他们自命的精锐之师，实际精神上已崩溃了，名曰在平汉线南段布防，也只能抱着一条铁路和一条公路，虚张声势而已。回汉后，大家把前后方的情况一对照，心里就更有数了。而报纸、通讯社都有各自的政治态度，记者的文章也只能一个模式的应付。而历史向这些人提出的课题，不得不要记者们去认真的思考。“外联”的集体活动也逐渐趋于沉默的阶段了。

一九四八年底，辽沈战役早已结束，淮海大战的胜负已成定局。这时，桂系的白崇禧出于逼蒋介石下野的阴谋，摆出个以战求和的姿势，企图在国民党一败涂地的时刻，来谋求自己的政治出路。因之一场“和平运动”，便在河南、湖北兴起，“外联”的大多数记者在沉静的隆冬中又活跃起来了。他们报导了一些新闻，追索一些“和平运动”的内幕，妄想白崇禧能真正地接受和平解放。当时我曾把搞到的一份国民党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

要蒋介石下野接受和平谈判的电稿，以《一纸电文惊海内，十万貔貅下中原》的标题，写了篇通讯寄给上海的《新闻天地》发表了。捅出去，发泄一下华中地区的沉闷气氛。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虽表面上“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桂系却听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直接支持桂系”的谎言，在春节前后白崇禧变了卦，喊出要“戡乱”到底。实际，他的部队已龟缩到武汉外围仓子埠、孝感、应城一线了。

桂系在武汉的态度转变，人们明知这个垂死挣扎无济于事，许多报纸老板却急于准备逃命了。如《武汉日报》准备迁桂林，《汉口报》准备迁厦门，《正义报》要迁衡阳，《华中日报》要迁广州。有些报无力南逃，如《晨报》、《新闻晚报》、《导报》、《劳工日报》、《舆论报》等报纸的老板们都准备把报纸停刊逃走。消息传出，对一群穷记者的威胁就大了。走都不愿走，等待解放。但这一段时间生活费从何而来？因此，“外联”便与报社老板进行了一场要生活费、“应变”费的经济斗争。三月间，许多死硬派的报老板纷纷南逃，此时党领导的护厂斗争也在各单位展开了，职工提出要“应变费”，老板拿不出钱只好把机器设备丢下而去，或委托人管理继续出版。老板走了，报社经济困难，矛盾就更多了。四月间，《中国晚报》、《建国晚报》的记者，就因要求改善待遇而“罢采”，自动休息了几天，害得编辑人员只好剪抄日报的消息来出版。此事引起各日报记者也纷纷向社方提出类似的要求。

“外联”在四月十一日开了一次全体会员会，决议推选朱文尧、詹沙浪、胡敬平和我共四人为“外联”代表，约同编辑人员，印刷工人的代表，向“报联会”（报纸发行人的组织）交涉，该会却采取推拖办法，不得结果，最后闹到我们宣称“限制各社负责人（社长及其眷属）在同人生活未得合理解决之前，不得离开武汉，否则采取不得已之有效行动。”虽然经济成效不大，但也

迫使一些报社不敢随便把机器设备运走。最后还是由报社向中央银行借了些银元，职工每人发了点生活补助费，才算告一段落。

一九四九年春间，一些有“特种身份”的记者，因大局已定，不大在社会上活动了；而“外联”的多数记者，却显得活跃起来，而且常借机会到桂系的部队里去采访。他们除了正常采访报道外，却还要搞些“副产品”回来。如部队官兵情绪、武器装备、兵力部署，以至高级军官的思想动态等（这情况武汉解放以后，大家见面谈起来才知道的）。一九四九年春节后，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授意各报社搞个“前线访问团”到孝感、信阳等地去“打打气”，同去了十五个记者，我任团长，“长官公署”还派了五个将校级的军官陪同一道，我知道这是对我们一群不放心。我便把情况向领导我的城工部的同志讲了，他给我打气说：“怕什么呢！只讲风月，莫谈国事，何况你与他们司令、军、师长都是熟人。此行去比不去好。”所以此行虽然“官方”接待热情、防范严密，而我们的同行们除写了些应付反动派的新闻报道外，也还“采访”了当时急于需要弄清的一些情况，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点应该做的事情。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武汉解放。早晨，“外联”的记者群随着武汉民主人士驱车到江岸黄家客栈迎接四野的一一八师进入市区。第二天各报刊出了有历史意义的报道。此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外联”已无存在的必要，不宣而散了。这些成员中，少数共产党员都走向了新的岗位，有地下工作关系的同志都由武汉市军管会或中南文化部作了妥善安排，还有那么几个“特务”身份的人，也到他们应去的地方去了。

“外联”的存在仅只短短的一年，从活动上看，并无什么惊人之举。只是一小群知识分子想组织起来做点于人民有益的事情，结果只是稀稀松松软软弱无力地闹了一阵。

C.C.在湖北的实力派——“十人团”

刘 鸣 皋

成立经过 并入C.C., 迅速发展 抢官夺权, 伸向各个领域——
(一) 钻入军队, 找到又一靠山 (二) 卷土重来, 党权是争 (三) 抓政权, 抓实权 (四) 抢占教育阵地 (五) 渗入民意机构 (六) 办报、抢报
(七) 亦官亦商 (八) 互相提携 与政学系的一场恶斗

湖北“十人团”是以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党务工作人员训练所(以下简称“党训所”)毕业生组织起来的,成立于1930年,原系一个由十个人拜把兄弟组成的封建性小组,1933年并入C.C.,迅速发展。它是一个具有政治野心的集团,拼凑起来,在于上下勾结,互相吹捧,窥测方向,看准时机,有计划、有预谋地耍弄各种手段,搭乘不同阶梯,扩大势力范围,拼命向上爬,当官作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以遂其“名利双收”的目的。从成立直到解放前近二十年间,在湖北省内党政军各界,确都据有重要地位,甚至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有相当势力。

“十人团”长期效忠于人民公敌蒋介石,追随C.C.首领陈立夫之后,攀龙附虎,推波助澜,反共反人民。随着它在国民党内势力日益增长,罪恶也愈益深重!

成立经过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下令停止国民党党务活动。另行举办全国党员总登记，实质上就是清洗共产党员。这时，国民党在各省、市党部设立党务工作人员训练所，培训办理登记的工作人员，湖北省党部与汉口特别市党部合办“党训所”，所长由省党部训练部长、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兼任。市党部训练部长孙绳任副主任，教务主任汪奠基、训育主任潘宜之、总务主任王绍祐、艾毓英、杨锦昱也分任指导员和队长，“党训所”办了两期，第一期是保送的，一个月结业，第二期是招考的，六个月结业。我是北伐军未到武汉以前的党员，又曾担任过省立一中教员和《中央日报》编辑，由汉口市党部保送前往受训，结业后回汉口市党部办理党员登记。先任第七区党部常委，不久升任汉口市党部宣传指导科主任。其他一、二期同学也都分发到省、市党部和各县党部工作。

1928年，蒋介石派“中央军”把在武汉的桂系李宗仁、胡宗铎赶走。原来的省、市党部停止活动，另行成立“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多为黄埔学生。

1930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要求迅速把各县党务整理完竣，以便召开全省党员代表大会，选举省党部的执、监委员。我和“党训所”同学张导民、陶尧阶、崔从灏、王延烈、周宗颐等六人同在省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会工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提出“党训所”同学团结起来，作好一切准备，竞选本届执、监委员。于是我们六人邀请另外在武汉工作的袁雍、钱云阶、王维时、王道义等四人共十人，以换兰谱的方式结为拜把兄弟，共同发起组织“党训学术励进社”，是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由于首先由十个人发起的，而这十个大多爬得比较高，有点名声，通常呼为“十人团”，正式名称反而为人们所遗忘。